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政策比较研究

◆ 王健栋

(山西大同大学商学院 大同 037009)

摘要: 本文通过运用 OECD 农业政策评价方法, 研究“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变化过程及发展现状, 以期把握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最新变化趋势, 为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农业合作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通过比较分析 OECD 测算的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水平发现, 中国对农业的总支持量、农业生产者支持量和一般服务支持量均较高, 农业的总支持量占 OECD 的比重在 50% 以上;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农业总支持量、农业生产者支持量的比重较高, 平均在 20% 以上, 但其农业消费者支持量比重最低; 乌克兰对农业的总支持量、农业生产者支持量较低, 但其农业消费者支持量最大, 除了 2010 年为负值外, 其余年份均为正值, 平均为 15 亿欧元。

关键词: “一带一路”; OECD 评估; 生产者支持; 一般服务支持; 消费者支持

DOI: 10.13856/j.cn11-1097/s.2018.11.013

1 引言

2013 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 沿线涉及 65 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有着众多的农业大国, 农业资源丰富, 但各国之间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国家政策、农业现代化程度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1-3]。

19 世纪末, 中国国内开始研究农业支持政策, 关注中国农业生产者支持的测算和农业补贴对象。田维明测算了 1986 年主要农产品的补贴额^[4]; 朱希刚等测算了 1990 年农产品补贴额, 提倡农业补贴应由消费者向生产者转移^[5]; 李先德运用 OECD 农业政策评价方法测评了 1994—2003 年中国农业支持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农业支持水平呈增加的趋势, 但总体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6]; 李扬分析了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提出中国应针对补贴重点加大补贴力度, 建立农业补贴的长效机制^[7]。孙玉竹等基于 OECD 政策工具的生产者支持水平对典型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对发达国家支持结构和支持水平的变化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8]。农业支持政策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重点,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支持政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以往研究表明, 各国之间农业支持水平差异较大。中国的农业支持水平有所增长, 且随着

作者简介: 王健栋 (1976—), 男, 山西大同人, 讲师, 研究方向: 经济管理、财会审计, E-mail: WJD760127@163.com。

时间的推移,增长速度加快,但中国的整体农业支持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对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部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发生巨大变化,农业支持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动。然而学术界对近些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研究并不充足,对沿线各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比较研究更少。本文选取中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越南9个国家(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运用OECD农业政策评价方法^[9-15],研究其2010—2016年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过程,为了解农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最新动态与变化趋势提供参考。

2 农业财政补贴政策评估指标

2.1 绝对值指标

农业总支持量估计值(TSE)反映政府对农业部门的财政资助每年从纳税人和农产品消费者转移到农业生产者的总价值。农业支持总量主要包括对生产者支持量、一般服务支持量和消费者支持量。

生产者支持量(PSE)是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核心指标,是按照农户销售价格测算出来的、由农业补贴政策措施产生的、每年由纳税人和消费者转移到农业生产者的净现金转移额。

一般服务支持量(GSSE)是由一国政府对农业部门实施的一般性(或公共性)服务政策而引起的价值转移。长久来看,GSSE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但是不会对农户的收入或消费者的支出造成直接影响。

消费者支持量(CSE)是在市场价格支持出现负值的情况下发生的,即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促使消费者消费大量的农产品。另外,它是政府财政直接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

2.2 相对值指标

%TSE表示一国某年农业总支持量估计值(TSE)占该国当年GDP的比重。%TSE值越高,表示该国国内收入用于支持农业的开支越大。

%PSE表示生产者支持估计值(PSE)占以农场价格水平计算的农场主生产总收益(或全部农产品产值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比。

%GSSE表示对农业一般服务支持估计值(GSSE)占TSE的比重。一国%GSSE值越高,意

味着该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影响越小,对农产品贸易扭曲程度越低。

3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越南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时将OECD成员国的总体情况作为对照。运用OECD农业政策评价方法,研究2010—2016年农业支持政策变化趋势^[16-21],选取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1 农业支持政策绝对值指标的比较分析

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俄罗斯对农业的总支持量较大,而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越南对农业的总支持量较小,均在50亿欧元以下。中国对农业的总支持量最大,在1000亿欧元以上,近年来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2012年农业总支持量增长率为62%,最高年份是最低年份的1.2倍。印度尼西亚对农业的总支持量仅次于中国,且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菲律宾和土耳其对农业的总支持量变化趋势不大。乌克兰对农业的总支持量最小且呈下降趋势,2013—2016年农业总支持量为负数。越南对农业的总支持量处于倒数第二位且呈下降趋势,2015—2016年农业总支持量为负数。这些国家中,农业总支持量最大的国家是农业总支持量最小国家的100倍左右。2012—2016年中国占OECD的比重在50%以上;2010—2013年印度尼西亚占OECD的比重在10%以下,2014—2015年印度尼西亚占OECD的比重超过10%(图1)。

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中国农业生产者支持量(PSE)最大。在700亿欧元以上。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5%,2012年与2015年PSE增长率较大,分别为86%和32%。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PSE仅次于中国,其中印度尼西亚的PSE在130亿欧元以上,2011—2015年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0%,2015年PSE增长率最大。俄罗斯的PSE在80亿欧元以上,整体变化趋势不大。哈萨克斯坦的PSE在2010—2015年整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4%,但2016年

其 PSE 为负值。乌克兰与越南的 PSE 较小，总体呈下降趋势，乌克兰自 2012 年呈下降趋势，2013—

2016 年 PSE 为负值，越南 2014—2016 年 PSE 为负值（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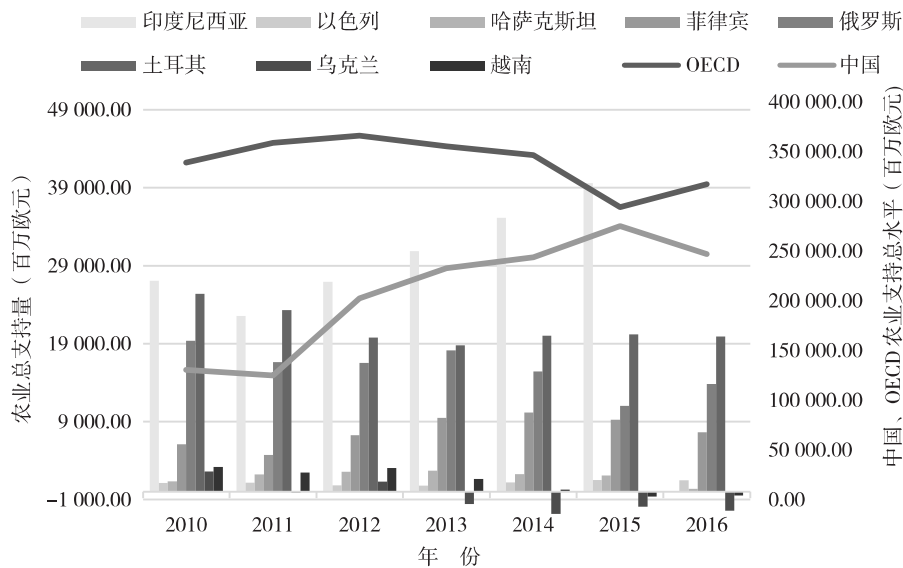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总支持量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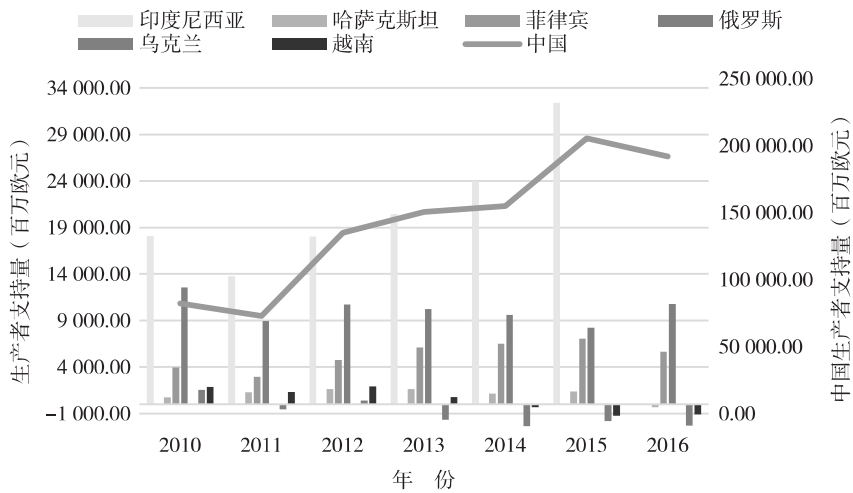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生产者支持量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除了乌克兰外，其他各国农业消费者支持水平基本全为负值。其中，中国的农业消费者支持量（CSE）最低，且呈下降趋势。中国的 CSE 低于 OECD 的数值，2015 和 2016 年中国的 CSE 约是 OECD 的 1.2 倍。印度尼西亚的 CSE 也较低，呈下降趋势，下降率为 13%。俄罗斯和土耳其的 CSE 变化趋势不稳定，大致为 2010—2013 年呈增长趋势，之后又下降。乌克兰除了 2010 年 CSE 为负值外，其他年份均为正值，平均为 15 亿欧元，2011—2016 年 CSE 年均增长率

为 23%。以色列和哈萨克斯坦的 CSE 较高（图 3）。

由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一般服务支持量（GSSE）的变动情况可知，中国的 GSSE 最大，均在 150 亿欧元以上，年均增长率约为 11%，占 OECD 的 50% 以上。在 2010—2015 年呈增长趋势，2015 年增长最快且超过 OECD 的水平，2016 年有所下降。土耳其的 GSSE 变化趋势不大，平均在 20 亿欧元以上。俄罗斯 2013 年的 GSSE 最高，为 2 755 百万欧元，2013—2016 年有下降趋势。2015 年印度尼西亚的 GSSE 增长速度最快，为

44%。菲律宾的 GSSE 呈增长趋势，自 2013 年起超过 10 亿欧元，年均增长率为 12%。以色列的 GSSE

在各国中最低，变化趋势不大，平均为 1 亿欧元。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 GSSE 先增加后降低（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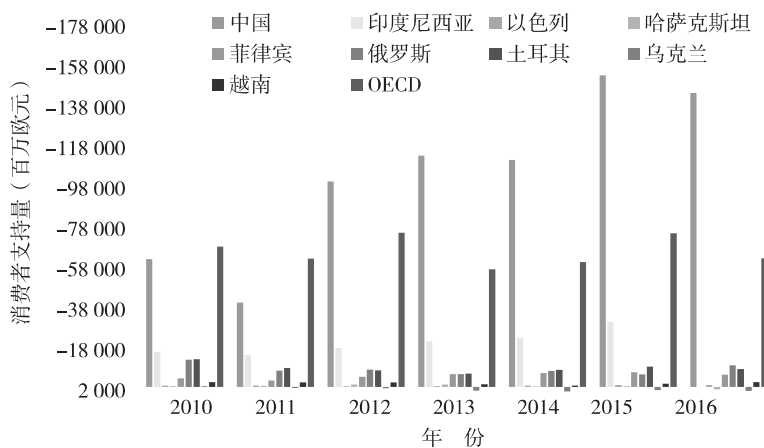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者支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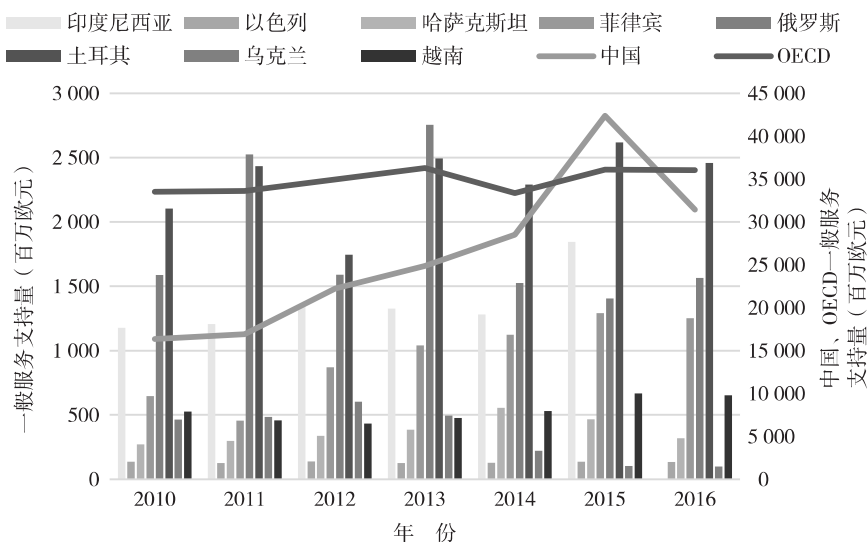


图 4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般服务支持量

从农业支持结构来看，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俄罗斯的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较高，农业消费者支持量比重最低，除乌克兰外，其他各国均为负值。哈萨克斯坦 2010—2015 年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高于一般性服务支持量比重，2016 年一般性服务支持量比重高于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乌克兰 2011—2016 年一般性服务支持量比重高于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越南 2010—2013 年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高于一般性服务支持量比重，2014—2016 年一般性服务支持量比重高于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

3.2 农业支持政策相对值指标的比较分析

表 1 为 2010—2016 年各国农业支持率变化情况。由表 1 可知，沿线各国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各年份农业总支持量占 GDP 的比重 (%TSE) 均较高，印度尼西亚 2015 年 %TSE 最高，为 4.59%，菲律宾 2014 年 %TSE 最高，为 3.57%；中国的 %TSE 除了 2011 年的为 1.65% 外，其他年份均大于 2%；以色列各年份 %TSE 均小于 1%，意味着以色列正在逐步降低农业总支持量，以减轻农业支持对财政的压力；俄罗斯 2010—2014 年 %TSE 呈下降趋势，2014—2016 年 %TSE 呈上升趋势；乌克兰和越南的 %TSE 较低，呈下降趋势，部分年份 %TSE 呈负值；OECD 的 %TSE 各年份均小于 1%。

表 1 各国农业支持率比较

单位: %

国家和地区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TSE%	PSE%	CSE%	GSSE%	TSE%	PSE%	CSE%	GSSE%	TSE%	PSE%	CSE%	GSSE%
中国	2.14	12.27	-9.39	16.58	1.65	9.28	-5.36	18.86	2.36	14.17	-10.65	14.13
印度尼西亚	3.58	21.19	-25.34	5.76	2.52	14.83	-20.84	7.44	2.93	17.48	-22.46	6.41
以色列	0.48	13.22	-11.89	16.12	0.46	12.51	-10.89	14.62	0.33	8.64	-6.32	20.88
哈萨克斯坦	0.93	9.39	-4.25	26.35	1.17	11.06	-5.03	18.44	1.24	15.15	-10.88	16.86
菲律宾	3.06	21.52	-21.92	13.99	2.13	14.48	-15.08	13.30	2.90	20.82	-21.40	15.38
俄罗斯	1.19	22.40	-19.24	10.85	0.82	12.59	-10.23	21.09	0.77	14.75	-10.02	12.37
土耳其	3.28	27.48	-28.01	10.98	2.79	23.72	-21.34	14.54	2.26	21.60	-18.35	11.34
乌克兰	1.93	6.43	-2.65	23.32	-0.04	-1.90	3.44	981.01	0.75	1.44	3.15	59.14
越南	2.81	8.74	-13.42	22.02	1.85	4.87	-10.00	25.61	1.97	7.03	-10.22	18.15
OECD	0.78	19.86	-9.26	13.10	0.80	18.55	-7.83	13.02	0.79	19.07	-8.66	12.28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TSE%	PSE%	CSE%	GSSE%	TSE%	PSE%	CSE%	GSSE%	TSE%	PSE%	CSE%	GSSE%
中国	2.40	14.74	-11.23	14.17	2.33	14.53	-10.73	15.52	2.52	15.67	-12.12	17.11
印度尼西亚	3.38	20.41	-25.66	5.71	3.95	24.31	-30.08	4.84	4.59		-34.40	5.17
以色列	0.27	7.39	-6.36	20.98	0.40	12.26	-9.55	13.91	0.51	17.78	-12.79	9.87
哈萨克斯坦	1.15	13.29	-10.06	18.82	1.03	9.69	-2.26	32.34	1.14	11.37	-2.82	24.50
菲律宾	3.49	26.49	-27.31	14.54	3.57	26.65	-27.34	14.66	3.17	25.68	-25.59	15.43
俄罗斯	0.81	13.24	-7.80	20.17	0.76	13.21	-10.38	13.13	0.84	12.21	-9.29	14.12
土耳其	1.98	21.38	-18.03	17.62	2.14	25.24	-21.51	15.18	2.35	26.15	-22.86	14.36
乌克兰	-0.84	-5.01	8.74	-42.61	-2.10	-8.80	15.49		-2.10	-7.53	11.34	
越南	0.97	2.82	-6.20	38.32	0.15	-1.13	-2.61		-0.31	-3.26	-4.71	
OECD	0.75	17.92	-6.97	13.56	0.70	17.88	-7.20	12.78	0.58	17.89	-8.35	13.62
国家和地区	2016 年											
	TSE%	PSE%	CSE%	GSSE%								
中国	2.22	14.51	-11.16	14.07								
印度尼西亚		29.11										
以色列	0.47	17.08	-12.25	9.81								
哈萨克斯坦		-3.18	13.85	84.27								
菲律宾	2.52	21.13	-22.03	18.12								
俄罗斯	1.09	16.06	-15.77	12.50								
土耳其	2.80	27.89	-22.33	13.66								
乌克兰		-9.46	14.54									
越南	-0.24	-2.88	-6.99									
OECD	0.60	18.77	-7.32	12.55								

由生产者支持率数据可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土耳其的生产者支持量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PSE)较高,平均在20%以上,2010—2016年土耳其的%PSE均高于OECD,2012—2016年菲律宾的%PSE均高于OECD,印度尼西亚%PSE大致呈上升趋势;乌克兰的%PSE较低,越南的%PSE均低于10%,2014—2015年乌克兰与越南的%PSE为负值;俄罗斯的%PSE除2010年为22.40%外,其他年份均在10%~20%;中国的%PSE除了2011年为9.28%外,其他年份均大于10%,整体趋势变化不大。

一般服务支持率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一般服务支持率(%GSSE)均不稳定。OECD平均值为12.99%,整体变化趋势较小。哈萨克斯坦%GSSE平均值最大,为31.66%,其中2016年最高,为84.27%,2012年最低,为16.86%;越南%GSSE较高,平均值为26.03%;中国%GSSE平均值为15.78%,变化趋势不大,其中2011年%GSSE最高,为18.86%,其次是2015年,为17.11%,2016年最低,为14.07%;以色列%GSSE较高,平均值为15.17%,2013年%GSSE最高,为20.98%,2016年最低,为9.81%,年际变化较大;印度尼西亚%GSSE较低,平均值为5.89%;菲律宾%GSSE整体呈增长趋势,2010—2016年平均值为15.06%;俄罗斯%GSSE平均值为14.89%,其中2011年%GSSE最高,为21.09%,2010年最低,为10.85%;乌克兰%GSSE平均值为-235.29%,2012年最高,为59.14%,2011年最低,为-981.01%,变化幅度很大。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比较分析了OECD测算的2010—2016年“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水平,研究发现:中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对农业的总支持量、农业生产者支持量和一般服务支持量均较大。其中,中国对农业的总支持量、农业生产者支持量及一般服务支持量均最大。中国的农业总支持量在1000亿欧元以上,且呈增长趋势,2012—2016年中国农业的总支持量占OECD的比重在50%以上;农业生产者支持量在500亿欧元以上,也呈上升趋势;一般服务支持量在150亿欧元以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农业总支持量较高,农业生产者支持量占农

业总收入的比重较高,平均在20%以上,但其农业消费者支持量比重最低。乌克兰对农业的总支持量最小,在30亿欧元以下,部分年份为负值,呈下降趋势,且其农业生产者支持量较低,但其农业消费者支持量最大,除了2010年负值外,其他年份均为正值,平均为15亿欧元,而其他国家农业消费者支持量基本全为负值。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农业总支持率、生产者支持率较高,其中生产者支持率平均在20%以上。但其一般服务支持率较低。OECD平均值为12.99%,整体变化较小。沿线各国一般服务支持率均不稳定。哈萨克斯坦一般服务支持率平均值最大为31.66%,其次是越南的一般服务支持率较高,平均值为26.03%。乌克兰变化最大,一般服务支持率平均值为-235.29%,2012年最高为59.14%,2011年最低为-981.01%。

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一般服务支持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均在150亿欧元以上,占OECD的比重超过50%。从农业支持结构来看,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俄罗斯的农业生产者支持量比重较高,农业消费者支持量比重最低。从各国农业总支持量、生产者支持量、一般服务支持量和消费者支持量来看,由于农业本身的特点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各国都不断加大对本国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论是通过消费者转移还是财政转移,对农业生产者支持是主要的方式。中国对农业的支持起步晚,但增长速度较快,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加强了一般服务支持水平。

通过比较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的2010—2016年“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农业支持水平,有助于把握沿线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最新变化趋势,有助于客观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各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为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农业合作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对推进本国农业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 [1] GULATI Narayanan. Demystifying fertiliser and power subsidies in India [J].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2000, 35 (35): 784-794.

(下转第206页)

- [J]. 农村经济, 2006 (1): 43-46.
- [12] 周曙东, 胡冰川, 吴强, 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农产品贸易的动态影响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6 (10): 14-21.
- [13] 韩彩珍, 时殷弘. 东亚区域合作的瓶颈问题与中国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4 (2): 32-36.
- [14] 于震, 李晓, 丁一兵. 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8): 21-38.
- [15] 孙林, 倪卡卡. 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及国际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4): 139-147.
- [16] 周文玥, 何敏.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十国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分析及展望 [J]. 农业展望, 2017 (12): 79-86.
- [17] 赵亮, 穆月英. 东亚“10+3”国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分解及比较研究——基于分类农产品的CMS模型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4): 61-74.
- [18] 陈恭军, 田维明. 亚洲农产品贸易格局的长期变化趋势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国际贸易, 2012 (6): 20-24.

(责任编辑 张雪娇 殷 华)

(上接第 76 页)

- [2] FAN S, GULATI A. 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learning from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forms in China and India [J].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2008, 43 (26/27): 137-144.
- [3] 孙玉竹. 典型国家农业支持水平及结构比较分析 [D]. 保定: 河北农业大学, 2015.
- [4] 田维明. 中国农业发展: 思考与探索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
- [5] 朱希刚, 万广华, 刘晓展. 我国 1993 年和 1994 年农产品生产者补贴等值的测算 [J]. 农业经济问题, 1996 (11): 37-42.
- [6] 李先德. OECD 国家农业支持和政策改革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 27 (7): 69-74.
- [7] 李扬. 试析我国农业补贴政策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6 (6): 195-197.
- [8] 孙玉竹, 闫琰, 杨念, 等. “一带一路”倡议下俄罗斯农业支持水平及政策分析——基于 OECD 农业政策框架 [J]. 世界农业, 2017 (11): 104-111.
- [9] 朱满德, 程国强. 中国农业政策: 支持水平、补贴效应与结构特征 [J]. 管理世界, 2011 (7): 52-60.
- [10] 程国强, 朱满德. 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补贴制度与政策选择 [J]. 管理世界, 2012 (1): 9-20.
- [11] 刘福江, 孙立新, 毛世平. 农业支持政策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 (2): 34-41.
- [12] 廉桂萍. 加大财政对农业支持力度 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3 (11): 51-53.
- [13] 马晓春.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比较研究 [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
- [14] 王仲辉, 吴亚琴.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农业贸易合作的研究 [J]. 中国发展, 2017, 17 (4): 38-44.
- [15] 方伶俐, 王雅鹏. 中外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 7-10.
- [16] 宗义湘, 闫琰, 李先德. 巴西农业支持水平及支持政策分析——基于 OECD 最新农业政策分析框架 [J]. 财贸研究, 2011, 22 (2): 51-58.
- [17] OEC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t a glance 2006 [J]. OECD, 2006.
- [18] OEC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mplete edition [M]. OECD, 2009.
- [19] BILGIC M, HANKE S H, ANAND R, et al.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t a glance 2010 [M].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0.
- [20] OECD. Agricultural polic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2014.
- [21] 李富佳, 董锁成, 原琳娜, 等. “一带一路”农业战略格局及对策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6): 678-688.

(责任编辑 肖时花 段丽君)

